

文
献
篇

历史文献概论

历史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此文拟从三方面谈有关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问题。

中国历史文献的繁富

1. 史书编写的日盛 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它包含所有书面的历史资料。历史文献，有史书，有历史档案，还有其他方面的资料。史书是指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和经过编辑整理的资料。

史书在中国开始出现，当不会晚于西周末叶。从《史记》所保存的材料来看，除鲁的纪年较早外，齐自献公以下，燕自惠侯以下，蔡自武侯以下，陈自幽公以下，杞自武公以下，卫自顷公以下，宋自僖公以下，晋自靖侯以下，楚自熊勇以下，才开始有了纪年。只有杞武公是周厉王以后的人，齐献公等 7 人都当厉王时期，而生卒略有迟早。周王朝在武王时即已一度有了纪年，但也是从厉王起，以后各王的纪年才都有了（《史记》有关各国世家、《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共和庚申以前无甲子纪年》）。编年史大概是史书最早的形式，也是官修史书最早的形式。《墨子·明鬼》历举各书以证成说。于西周晚年的事，引“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所谓“春秋”，当是编年史的通称。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这一形式，在甲骨文中已可见到它的雏形，而后来的《春秋经》和《竹书纪年》也都继承了这一形式。但当时的编年史也不一定都写得这样简单。

《韩非子·奸劫弑臣》引《春秋》记崔杼事，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崔杼杀齐庄公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

孔子修《春秋》，是我国私人修史的开始。战国时期，私人所修史书有《左传》、《国语》、《战国策》，各国官修史书仍在继续。晋太康间在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于三代以下独记晋史，于晋亡后专记魏史，应是魏国官修的编年史书（《晋书·束皙传》、《竹书纪年》辑本）司马迁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讽刺也。”“独有秦记，又不载年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可见秦和六国都有官修史书，而未为秦火烧的，只有《秦记》一种而已。他又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历谱牒》，可能是先秦古书流传下来的，而成为司马迁著《十二诸侯年表》的依据，它也是编年的史书。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这里所谓“春秋”，都是史书。这可见战国时期，历史知识之受重视，而诸子著述也多有史事汇录或史论的性质。至于《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书的一些篇章，不只记言，也还记事，颇有言行录的性质，这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也是史书的一种形式。

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这是一部比过去的编年史大为丰富的史书。东汉时，班

固因袭《史记》体裁，断代为史，写成记载西汉一代史事的《汉书》。此后，修东汉史者，官修有《东观汉记》，私修者有《后汉书》等 10 家，但仅范曄的《后汉书》纪传部分和司马彪《续汉书》志的部分流传下来。三国史事，私修者有 5 种，而仅有陈寿的《三国志》流传下来。此后，修晋史、南北朝史者，都有多家。《隋书》以后的纪传史，基本上都是官修。清乾隆帝规定，自《史记》以至《明史》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称“二十四史”。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前后相续的历史巨著，共 3200 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不少纪传体史书，如《清史稿》等。

纪传体史和编年史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宗。在纪传体盛行同时，编年史的官私撰写仍有进展。《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下有《汉著记》190 卷，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这当是官修的书。《隋书·经籍志》于史部内，专设起居注一类，著录《汉献帝起居注》以至《南燕起居注》43 部，1183 卷。自隋以后，一直到清，都设有掌起居注的专职史官，而成书情况已不可详。《隋志》在杂史类中又著录有周兴嗣《梁皇帝实录》，记梁武帝事；有谢吴《梁皇帝实录》，记梁元帝事。此后，自唐初以至清末，历代皇帝都有实录，而明清两朝实录的卷帙重大，《明实录》有 2700 多卷，《清实录》有 4300 多卷。这些起居注和实录都是官书。

私人所修编年史，自荀悦《汉纪》以后，作者渐多。写《后汉纪》的有袁宏、张璠两家。写《晋纪》、《晋阳秋》等晋史的有干宝、孙盛等 12 家。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中的杰作。全书 294 卷，记战国迄五代 1362 年间史事。光又别撰《资治通鉴考异》30 卷，《资治通鉴目录》30 卷，《资治通鉴举要历》80 卷，还有《历年图》、《百官表》、《稽古录》等都是跟《通鉴》相表里的书。其后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10 卷，袁枢撰《资治通鉴纪事本末》42 卷，清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184 卷，毕沅撰《续资治通鉴》220 卷，夏燮撰《明通鉴》90 卷，都是补续或改编《通鉴》之作，而关于《通鉴》的

研究也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南宋李焘采用《通鉴》的体例，为书记北宋的史事，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举要目录》69卷，共1036卷。李心传记宋高宗时事，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记宋金间结盟败盟的史事，为《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宋人编著编年史之盛，可说是远过于前人了。

典章制度自《周礼》、《仪礼》以至历代职官、法律、文告、条陈，自《尚书》以至历代诏令奏议的汇集，都是史书的重要内容，其种类也日趋繁多。《通典》、《续通典》和《清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和《续清文献通考》，连续起来是彼此可以贯通的典章制度的通史。对《通典》和《文献通考》的评价，一向于二者间，有所轩轻，但都是有材料、有见识之作，其地位与《通鉴》不相上下。《唐大诏令集》和《宋大诏令集》，《唐会要》和《宋会要》，《明会典》和《清会典》，《唐律疏议》和《大诰》，《历代名臣奏议》和《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等，都是有关方面的专书和资料汇集，都是比较重要的史书。

史书的发展，总是受社会条件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重门阀、讲地望、尚清谈，于是氏族谱书多起来了，乡贤传多起来了，名人传、高士传、列仙传也多起来了。这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这三志的史部专设谱牒类和杂传类著录这几方面的书籍。《新唐书·柳冲传》说：“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诠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由此可见，自晋以后，谱学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唐代初叶，有《大唐氏族志》100

卷、《姓氏谱》200卷的修撰 柳冲也撰《大唐氏族系录》200卷。谱学至五代时已经不讲，晋以至唐末的宗谱姓氏的专书只有林宝撰的《元和姓纂》流传下来。但宗谱的编修并未因此而中断。一直到了近代，大姓还多有宗谱，偏僻地区的小康人家往往也有宗谱。宗谱里面，有许多在别的文献中看不到的资料，应该注意收集，妥加保管，使其发挥作用。

关于学术发展的论述，《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已略露端倪。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以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重视了“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对学术流派开始有较多的论述。各史多有儒林传、文苑传，这是关于文人学者的传记。至于论述学术史方面的专书，似以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开始。这是道学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派，并且还面对着不同学派的争论，从而产生的成果。经过宋元明以至清初，政治形势大变，学派的存在遭到很大的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为宋元明的道学及其有关的学派作了总结。这两部学案是中国学术史方面的创举。黄宗羲没有把《宋元学案》完成，其子黄百家续修也没有完成。全祖望为之增补，稿成而死，后经宗羲之玄孙稚圭及其子平黼与王梓材先后校订，始得完成。在两学案以外，学术史的专书很少，但与学术史有关的书是很多的。

地方志在我国史书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方志是地方之史。各地区之史是方志，总各地区之史为一书者也可说是方志，或称之为方志中的总志。方志似始于《吴越春秋》和《华阳国志》。春秋时期虽各国有史，《国语》也分国记事，但其特点在于记王侯统治国家的政治，而不在于记地区性历史的发展，一般不称之为方志。隋有《区宇图志》初为250卷，后增修到1200卷。这是官修方志之始。唐有《括地志》550卷。宋有《元丰九域志》元明清各有《一统志》都是官修，卷帙也多。至于私人著作，唐贾耽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贞元十道录》10卷等。贾耽是唐代博学的政治家，也是

地方史的大家。唐李吉甫有《元和郡县图志》40卷，宋乐史有《太平寰宇记》200卷，都是方志中知名之作。明清两代，是方志编修大大超过前代的时期。现存方志有8000多种，其中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书，而清修更多。明清方志之多，是这时期史学发展上的一个很大特点。方志书里保存的资料也是多方面的，也要善于利用。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輿纪要》130卷，是历史地理中讲形势、讲地区性特点的名著。还有章学诚，对于方志的撰修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见于他所著《文史通义》及《章氏遗书》中的有关文章。

丛书往往汇集了罕见的史书或史书的善本，类书保存了古佚书的篇章或片断，都是读史者所应注意的。

以上所述，只是关于史书的几个主要方面。这已可见我国史书的编修，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在涉及的领域上越来越扩大。如何整理这些史书，使它们更便于发挥作用，是史学工作中很艰巨的工程。

2. 历史档案的积存 档案是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以备查考的文卷。这些文卷，主要是官方的原始文件，但也有备日后查考需要而归档的非原始性的文件。非官方组织如私有的工厂、企业、学校等也有自己的档案。档案经过整理，汇集成书，可称为史书，但就其内容来说，仍是档案，不过是公开的档案罢了。

我国档案的积存，在殷商时期已经开始。保管档案的机构，在周朝已经建立。《尚书·序》有“武王有疾 周公作金縢”的记载。孔颖达疏说：“郑云：凡藏秘书 藏之于匱 必以金緘其表。”可见在西周初年，周公已注意到档案的妥善保管。书藏于匱，金緘其表，成为后世对保管档案的专门措施。

《汉书·高帝纪》下记两汉初年，“天下既定，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 金匱石室 藏之宗庙”。颜师古注说：“以金为匱 以石为室 重緘封之 保慎之义。”这说明了西汉保管档案的情况。“金匱石室”成了收藏重要文书档案的专门场所。司马迁作《史记》时，“？史

记石室金匱之书”，就是利用了石室金匱所藏的档案材料。

东观、兰台是东汉洛阳宫中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唐朝档案由史馆保存。宋元的架阁库，明朝的皇史宬，清朝宫里的内阁大库，都是历代王朝专门建筑的集中保管档案的处所。

档案的种类很多。殷代甲骨所契卜辞，周代青铜器所刻铭文，《尚书》中所收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大都是当时的官方文书，都出自档案文卷。各个朝代发布的诏令、策命、上谕、圣训，以及政典、法则、诫训、案牘、计籍、记功册、簿记，以及诸侯、公卿、地方郡守等人给皇帝的奏章、奏议，都可作为档案。当时的档案文卷，日后就可成为修撰史书所依据的一部分材料。

前朝档案文卷对于新朝的建立，往往是有意义的，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汉高祖入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而萧何则“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史记·萧相国世家》）因此汉能够了解秦朝政治经济情况，取得进一步胜利，建立了汉朝。自汉以后，历代都有下诏求书的事，其中可能也包括档案文卷的搜求。

自宋以后，档案的积累比以前多了，档案文卷也有一些流传下来。本章第一节所举的《唐大诏令集》，是宋敏求任史馆修撰时，辑录唐朝诏令所编成，共 130 卷。这都是取自档案文卷的副本。书中所收都是《新唐书》未收，《旧唐书》也多未载者。今全书虽有残缺，仍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唐陆贽《陆宣公奏议》、宋范仲淹《政府奏议》等是今存的个人奏议。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150 卷是北宋至南宋初的奏议。本章第一节所举《历代名臣奏议》，是杨士奇等编写，共 350 卷，它和清官修《明名臣奏议》20 卷，收录了明及明以前各朝的奏议。这些奏议，如不是取自私家收藏的底本或自底本抄录的副本，当都是取自档案的文卷。

明以前的档案文卷，因时代久远，今已不多见。现存的原始档

案文卷，最早是明朝的，数量不多，且多残损。据统计，还有数千件。其中除有少许洪武、永乐等朝的文卷外，主要是天启、崇祯时兵部的文卷。数量虽不多，但 600 多年来的原件保留至今，也算是难得的珍品了。

清朝档案已印行的有《康熙上谕》、《十朝圣训》、《上谕内阁》，都是朝廷谕旨。专题档案印行的有《林文忠公禁烟奏稿》、《南海先生戊戌奏稿》等。清代的原始档案，从清入关前的天命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朝廷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官文书，以至清亡后溥仪暂居故宫和天津张园、静园时期的文件，都有收存，计约 900 余万件册。文件名目繁多，下行的制、诏、诰、敕，上行的题、奏、表、笺，平行的咨、移、关文，以及各种类型的函、电、照、单、图、册、札、片等，在百种以上。“其文字则大多数是汉文或满汉合璧，一部分是满文，并有一些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俄、日、拉丁等外国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

明清档案现藏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保存民国以来的档案，数量也很可观。其他省、市、地、县档案馆都藏有大量有关地区的历史档案。国家各部门、各机关、团体也都有其自己的档案，如军事档案、海关档案、科技档案、医学档案等。

少数民族的公私文件很多，但具体的数目尚有待于调查。在这些文件中，有多少已经立案归档，也不清楚。西藏所藏长期积累的文件甚富，但究竟有多少已完成入档程序的，也尚待了解。

建国 30 多年来，我们积累的文物不少，但一方面需要急于整理，一方面还要继续征集。

档案文卷，一般地说，是第一手资料，是当时事务发生、变化的记录，大部分档案的史料价值是较高的。马克思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

到一个错误。”（《答布伦坦诺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可见利用历史档案来评述历史上的问题，是有说服力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有的档案也不尽可信，有隐恶扬善的，有谎报军情的，有报喜不报忧的，也有由于时代的局限或阶级的偏见，而有种种失实的记载。所以在使用档案时，也要进行分析，去伪存真，使用其中真实可靠的部分。

随着科学的进步，档案的记录手段也在不断增多。目前档案已不仅限于文字的书写，还有录音、录像、摄影、拍电影等记录方法。同时，随着管理方法的不断改进，档案资料的使用也将逐渐更加方便。

3. 历史文献之包罗繁富 历史文献除史书和历史档案外，还包罗很多的内容 例如 哲学、数学、天文、历法、生物学、力学、化学、农学、水利、地理、建筑、机械、文学、音乐、舞蹈、书画、雕塑、戏剧等各方面的历史记载，也都属于历史文献。如按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史部当然是历史文献，经、子、集等部的书籍也应属历史文献。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关于解释儒家经典的注疏论说，是不是历史文献？原来属于经部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书，是不是历史文献？答复也应是肯定的。尽管这些注疏论说中，繁琐空疏的东西太多，但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一定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尤其在经学史的研究上，这些都是直接有用的历史文献。经学史是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个学科，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需要研究的。在传统的目录学上，文字、音韵、训诂书属于经部，实际上应该属于语言文字之学，它们在历史文献上的地位也是没有疑义的。

史部，一般都按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分类，但地理、时令、金石等，也都包括在史部之内。二十四史就有4500多万字。围绕二十四史作集解、正义、注释、补表、补志等书约有300多部。以上所举

历史书，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史部文献还有更多的种类。

子部是以先秦百家的著作为主，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纵横、小说家和杂家，以及天文、术数、艺术、宗教等都包括在子部之中。今天所说的哲学、政治、科技、艺术等类，过去也都放在子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此后，历代都有增加。围绕诸子书又有义证、校释、集注、通义等。仅《四库全书》著录和存目的子部书就有 2941 部。

集部，主要包括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诗文、歌赋、词曲等。唐以前的文集大部分已经散佚。唐以后的文集则数量甚大。《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已有 3401 种。《四库》编写以后的清人文集，据孙殿起《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著录有 4000 多种。其他未著录的传奇、戏曲、手札、尺牘、宝卷、弹词、谣谚等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一时尚无法得知。

以上是按过去用四部分类看文献包罗情况。但四部分类已远远不能包括现有的全部历史文献。如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碑石铭刻、释道经藏、报纸、杂志，兄弟民族用各种文字写成的书籍文卷，民间各种行会、帮派、工商业组织的内部文件，不少是珍贵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访求收集工作尚有待于开展。

我国的历史文献是极为丰富的。我国历史文献的长期连续性，是任何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生命力在历史上的体现。珍惜历史文献并尽最大努力使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庄严任务。

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

1. 文献目录学 有文献的积累，才有研究历史文献的可能。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脉相沿的发展，才有研究历史文献的必

要。中国历史兼具这两个条件，因此文献之学有悠久发展的历史。我国目前虽还没有把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建立起一个体系来，但前人在这个方面确已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关于文献目录学、版本和校勘、辨伪和辑佚、注解和考证的成就都是显著的。文献目录学是研究文献著录的学问，是研究文献要首先接触到的领域。目，指书名、篇名。先秦文献，往往没有书名而以作者名代替书名如《孟子》、《公孙龙子》之类。录指作者、书名、篇数或卷数、书的存佚、书的内容、流传情况等的记录。从历史的发展看，目录学的内容要比“目录学”这三个字在字面上所能表达的丰富得多。

汉初值秦火、战乱之后，文献损失很大。经过老师宿儒的口授和民间藏书的征集，朝廷又逐渐把文献收集起来。汉成帝时一面继续向民间征求书籍，一面命刘向等清理皇家藏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因向所叙录，跟本书别行，谓之“别录”。向死，子歆继续完成父业，将书分成六类，先作总说性质的《辑略》，又分别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是我国文献目录之学的开始，同时也重视了校勘和辨伪。刘向、歆父子的原书已佚失，《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七略》的梗概。依《汉书·艺文志》所记，此书不只是著录了书名、作者等项，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魏晋以后，书籍日多，目录学也有相应的变化。《隋书·经籍志》采用了新的分类法，把《七略》的六分法改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附以道书和佛书。经部相当于六艺，刘向、歆著录六艺，原有9种，今增多1种。史部原附于六艺之《春秋》，今独立为部，凡13种。子部相当于刘向、歆所著录的诸子、兵书、术数和方技。原有诸子10家，兵书4种，术数6种，方技4种，共24种，今合为14种。集部相当于诗赋。诗赋原有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之属、杂赋、

诗赋 5 种，今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 3 种。《隋书·经籍志》沿袭《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开始冠以总序，四部各有序及分类的小序。《隋志》的所谓“种”即我们现在的“类”。从《隋志》各章的内容看还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思，但如从它所“部次条别”的具体状况来看，则多不符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尽管如此，《隋志》的分类法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影响。

宋代目录学，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重视书籍的分类，注意分类的义例，这以郑樵的《通志》为代表。《通志》中的《艺文略》、《校讎略》、《图谱略》、《金石略》基本上都属于目录学的范围。《校讎略》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郑樵自称他“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第一，经类，分 9 家 88 种。第二，礼类，分 7 家 54 种。第三，乐类，1 家 11 种。第四，小学类，1 家 8 种。第五，史类，分 13 家 90 种。第六，诸子类，分 11 家 48 种。第七，星数类，分 3 家 15 种。第八，五行类，分 30 家 33 种。第九，艺术类，1 家 17 种。第十，医方类，1 家 26 种。第十一，类书类，1 家 2 种。第十二，文类，分 22 家 41 种。他说：“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总种数与分记种数不合，今存其原文）这可见郑樵对分类法的重视，在大的分类上也有所创新。但具体到各类中的子目，则无不牵强割裂。另一派是重视书籍的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属于这一派。他们也不是不讲分类，但重点是在于各书的解题上。这两派都分别发展了《别录》、《七略》的某一个方面。而郑樵对书的区划虽细，也未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水平。

宋元之际，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其中的《经籍考》有 76 卷之多。这也是沿着晁公武、陈振孙的路子而作的目录书。马端临自称：“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

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此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人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究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这一段话说明了《经籍考》的结构及取材的情况，也说明了编著的旨趣。依他所说，《经籍考》只是一部书一部书地介绍其要点，去《汉志》的要求已越来越远。马端临不为各书写解题，而采录别人的成品，这是跟《别录》很不相同的。但由于收罗的材料多，便于参考，《经籍考》还是有用的。

清乾隆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分别为著录及存目的所有书籍撰写提要，其中包括作者介绍、全书内容和流传情况，并论述书中得失，辨订书中文字。全部提要，由纪昀定稿，汇集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语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各部有总序，每类有小序，论述学术流变及分类旨趣。这是目录学史上的一部空前巨著，在区分类别及论述学术源流、评价各书高下等方面，间有新意，而粗疏草率之作也不少，在使用时须作具体分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外还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解题简略，删除存目，便于检阅。

清人所写目录书，种类之多超越前人。清末之洞《书目答问》和近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于浩瀚文献中，为读者提出若干种基本读物，便于参考，流传较广。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和《四库提要辨证》，是目录学上有功力之作。陈垣先生在目录学上也有贡献，其专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专门史的目录学，独具特色。

目录之学，自魏晋以后，分类渐细，而离开刘向、班固辨章学术的原意越来越远。这跟书籍的日益繁富，工作不易深入，有很大的关系。近世的公家收藏，仅仅作到“编次甲乙以便检寻”已不容易。目前国内各大图书馆，编目工作已成为很大的负担，有待于妥善地改进。

章学诚著《校讎通义》，总结了目录学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发展了《别录》、《七略》、《汉志》的遗绪，强调目录工作中要讲学术源流，要道器合一，要学贵专门。对于编目上的体例，书中也有论列。这是目录学史上很有创见的书，但还没有受到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尽管此书陈义过高，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但如按照它的要求，我们的目录学工作则不仅只是供检寻之便，而且还可以对读者读书起指导作用。我们应该吸取此书的精神，结合当前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对目录学工作有所改进。

我们认为，历史文献分类法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很复杂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历史文献学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应作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来看待。至于我们目前只求便于检寻的目录学，可作为应用的历史文献学中的一个部分。史学工作和有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应互相配合，解决分类法中的一些问题，如学术源流之类，并把这种工作作为历史文献学里的一个独立部分，跟一般所谓目录学分开。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就自己的专业建立专门的目录或目录学以利于进行工作。后者不必要求过高，但要时时改进，要努力把有关文献置于历史运动过程去考察和使用，不要使之长期处于甲、乙、丙、丁互相孤立的状态中。

2. 版本和校勘 文献经过传抄刊刻，很难没有错误，于是便须有校勘工作。一书之不同的抄本和刻本的出现，往往增加文字上的歧异和讹误。于是作校勘工作的，又不可不知版本流传的状况及各种版本间的关系。这就须要了解版本的历史及各种版本的具体情况。但仅从版本方面进行校勘，还是不够的，仍须有各科有关的专

门知识。因此，版本和校勘虽是两门很密切的学科，而又是各有自己特点的学科。这两门学科也跟目录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不可混为一谈。

今本《诗经·商颂》第一篇为《那》。《国语·鲁语下》记闵马父的话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宋大夫是孔子的先祖。他从周太师处得《商颂》十二篇加以核校。这可以说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校勘工作。

《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似，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个故事是说子夏发现记载中把‘己亥’错写作‘三家’。这是因‘己’字与‘三’字，‘豕’字与‘亥’字形相近而误。己亥，是晋师过河的日子。后来子夏到晋，经过事实的核对，果然晋师是在己亥日渡河，证明子夏所校的正确。这个故事常为人们引作早期校勘的实例。

自战国以至汉初，手抄的书即有不同的本子。以儒家经典而论，《易》有施、孟、梁丘等家，《书》有古文、欧阳、大小夏侯 3 家，《诗》有鲁、齐、韩、毛，《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等家。《论语》有古、齐、鲁 3 家。经学各家不只是说法上的不同，而且有本子上的不同。

《春秋》三传在经文上有异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刘向以皇家所藏《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 3 家经文，文字异者 700 有余，脱字数十。《论语》的 3 家，不只文字有不同，篇数也不同。《古论》21 篇，《齐论》22 篇，《鲁论》20 篇。汉代人张禹参照三家校定的《论语》本子（《汉书·艺文志》），一直流传下来。

刘向、歆父子奉命校理群书，很重视广集副本的工作，为利用多种副本进行校勘树立了范例。就现存《别录》仅有的佚文来看，刘向校《管子书》用了皇家收藏的 389 篇，私人 3 家收藏 79 篇，太史收藏 96 篇，去其重复，最后定为 86 篇。校《晏子》从 30 篇 838 章中，除去重复，定为 8 篇 215 章。校《列子》、《孙卿书》等也莫不如